

孔裔由仲：齊魯弘大愛 慈心育「星兒」

出身於孔子近支後裔之家，又是家中老二，母親為他起下「由仲」這個名字，暗合了孔子的大弟子子路的表字（仲由）。童年飽經文革離亂，中年定居香港後兒子卻罹患自閉症，苦難帶給勇者的，常是慈悲和豁達。也許正是子路為人稱道的勇敢精神鼓舞着由仲，他毅然放下高薪工作，投入到自閉症康復這項慈善工作中，並把國際先進的康復技術引入內地。

■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于永傑



■由仲與兒子安安在一起。



■由仲正與大家一起進行討論。

名門後代的苦難童年

山東省政協港澳委員由仲出生於名門望族，祖父由芝貴，是山東的老同盟會員，辛亥革命光復煙台時，他率先衝進煙台府衙門奪權，成為首義功臣之一。母親孔令仁是孔裔近支76代孫，曾就讀於赫赫有名的西南聯大。孔令仁不但是山東大學經濟學史的知名專家，還曾擔任全國政協常委、全國婦聯副主席、山東省政協副主席等社會職務。

然而對於出生在1960年的由仲來說，這些光環帶給他不是金光大道，卻是童年的苦難。

由仲的父親早在「反右」運動中就被打成「右派」，歸入「黑五類」分子。母親則在文革中被一輛幾噸重的運糧大卡車輾過，臥床半年險釀大禍。如今，由仲記憶最深刻的就是「抄家」。他們家在青島的一所大宅不斷搬進去各種陌生人，最終主人卻被擠到一間很小的房間。那時父親遠在青島，父母分隔兩地將近20年，母親帶着他們兩兄弟在膠濟線上往返奔波至少百次以上。

對於童年，由仲最遺憾的是，自己求學的黃金年齡正遇上動盪的時期，以至於文革結束前都沒有接受過正規系統的學校教育。文革結束後不久內地恢復高考，由仲通過自學考上大學，最後畢業於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。成為改革開放初期最早具有經濟學專業背景者之一。

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

上世紀90年代，由仲定居香港，從事經貿。1998年的父親節這天，兒子安安出生，中年得子，由仲的喜悅可想而知，但命運的殘酷卻給他當頭一棒，隨着兒子漸漸長大，由仲發現安安比同齡人發育遲緩，2歲時還不會說話。得知兒子罹患「自閉症」之初，由仲還能用「貴人語遲」的想法安慰自己，但「精神癌症」、「無法康復」這些關鍵詞卻在不斷地刺激着他做父親的心。他說自己從安安出生那天起，就「注定只能跟父親有緣而跟兒子無緣了」。

「有些事情當你還沒有經歷時，會感到恐懼。如果一旦不得不面對，就必須學會承擔。」由仲說。為了讓安安學會喊一聲

「爸爸」，由仲跑遍了香港和內地的康復機構。而當年香港的自閉症康復機構要排隊兩年，內地的康復醫療則尚處萌芽。為了兒子，由仲放下了手頭的生意，開始在港台參加各類自閉症康復培訓課程，自己為兒子進行康復訓練。

作為孔子後裔，「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」的儒家傳統道德可謂與生俱來。當安安的康復治療走上正軌，由仲就想到內地還有更多的自閉症孩子正在被疾病所折磨。於是決定全身心投入到自閉症康復教育事業中，發起設立了「香港安安國際自閉症教育基金會」，將關注的焦點轉向內地。2006年，濟南安安特殊兒童康復中心正式成立。

如今，濟南安安特殊兒童康復中心已經有一座3500平米的主樓、生活小樓、操場，各類設施基本完善。目前康復中心有全國各地前來求醫的家庭。為了減輕南方一些家長的負擔，同時帶動當地的康復水平，2011年、2012年福建福州、浙江台州的安安特殊兒童康復中心也相繼成立。而部分來自香港、美國的患兒家庭，因為想要孩子在漢語環境中恢復語言能力，也選擇到「安安」接受康復治療。「因為我們的康復水平不輸於國外，要比國內同行領先5至7年。」由仲說。

由仲坦言創辦之初困難重重，康復中心的資金全部來自「安安國際自閉症教育基金會」。自2008年起，山東政府主管部門開始給予一些政策及資金的支持，也有一些企業、團體為康復中心舉辦慈善義拍、捐助等。但康復中心每年對於教師的培訓、場地和設備的投入仍是一筆巨大開支。由仲說他將以前做生意的積蓄投了進去，現在還有近400萬的債務。



■孩子正在上課。

母子兩代緣繫政協

由仲的母親孔令仁曾擔任過全國政協常委，並連任三屆山東省政協副主席。由仲說，母親年輕時整日忙於參與政協的各項活動中，如今自己也擔任了山東省政協委員等社會職務，母子兩代政協人，「是一種情緣」。每年的山東省「兩會」上，由仲都積極呼籲政府關注私立自閉症康復機構的發展。他稱，公辦機構擁有政府提供的社工崗位、公益崗位，房租等開支亦少有壓力。而民辦機構一切都要自己負擔。他希望政府能設立標準，根據康復機構的水平來劃撥補貼資金，而不是以公立、私立為標準而區別對待。

籲公私機構同等待遇

由仲介紹，自閉症患者經過早期診治、康復治療及教育培訓，生活可以自理，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勞動能力，反之則可

能發展成精神分裂。而內地在自閉症問題上的科研經費投入基本為零，各類康復教育和職業培訓的水平也參差不齊。此外，由於社會大眾普遍對於自閉症缺乏認知，導致自閉症康復治療中出現「亂用藥、亂收費」現象。對此，他不斷在山東省政協會議上呼籲：「有必要建立長效的救助機制，重點解決學齡期職業技能培訓、就業和社會保障等問題，並從社會福利保障等多方面不斷完善法規條例，為患者及其家庭提供堅實的社會保障。」

由仲的建議已引起山東政協等部門的重視。而安安基金會在香港、內地的各項活動，都不乏山東政協委員的身影。此次赴濟南參加「兩會」，他帶了一些自閉症方面的書籍資料，由於行李超重，同行的港澳委員便一人分擔幾本帶至山東。



■安安教育的孩子正在家培班小組上課。

「下輩子我們還做父子」

2013年，香港安安基金會舉辦了「愛，共融，創明天」慈善演唱會，並將香港和內地二十四個自閉症家庭的故事匯編成書。這套書的序言裡，由仲給兒子安安寫了一封信：

親愛的兒子，或許你永遠不懂父親節的涵義，或許你也永遠成為不了父親。但為了你，我只求能夠健康快樂的多活幾年，讓你在我的照料下懂得父親節對你，對我，對天下所有父親的涵義。祝我快樂兒子。下輩子我們還做父子。

談及孔子思想對他的影響，由仲說或許是因為文革中的遭遇，自小母親很少跟他講四書五經，反而更希望他從事理工科。也許母親的善良、堅韌、誠實，潛移默化中給由仲的精神力量，要比背誦儒家典籍的影響大得多。所以由仲不大善於談論孔子的箴言，但人生的每一步都在向着孔子指引的方向前行。

小貼士：

自閉症，又稱孤獨症。由於自閉症兒童幾乎聽不見親人的召喚，也不能真切地感受和回應親人的愛，彷彿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天外來客，人們便用「星星的孩子」、「星兒」來稱呼他們。



■由仲與山東政協港澳委員等朋友在一起。



■香港安安基金會工作人員合影留念。

香港「花甲委員」的十年甘肅情

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朱世強 澳門出生，長住香港，已是花甲之年的馮翠屏是香港全港各區工商聯永遠榮譽會長。10年前，她通過「蘭洽會」與甘肅結緣，此後每年，馮翠屏都會不遠萬里帶着香港企業家參會考察。甘肅省「兩會」上，她是備受關注和歡迎的香港委員。今年甘肅兩會，因被記者圍堵訪問，馮翠屏錯過了搭乘大巴車的時間，花甲之年的她在冷風中等待出租車的情景感動了所有在場的記者。

十年前的甘肅初印象

馮翠屏的記憶中，2003年首次來到甘肅蘭州時，整個城市沒有喧囂，街道上車輛很少，四周的樓宇也並不高，尤其晚上更是漆黑一片。「晚上沒地方去，索性待在賓館看電視。」馮翠屏說，如今的蘭州，每年都有進步，建築越來越高，裝飾也很現代，商業區繁華得讓她覺得不是身在大西北。

2008年，一位澳門企業家找到馮翠屏說，想在內地捐建一所學校。當馮翠屏給他講解甘肅的貧困狀況時，這位企業家甚至覺得不可思議。於是，馮翠屏帶着他來實地考察。沒兩年，捐資25萬元人民幣建設的天水市張家川縣劉堡鄉李山小學拔地而起。

捐建者即是如今擔任甘肅政協委員的澳門企業家盧宏駿。[「老大姐」的號召下，參與會議的

所有港澳委員準備今年聯合甘肅「雙聯」扶貧行動集體出力，幫助這裡的貧困人口改善生活。」盧宏駿說。

「一點都想不起來了！」馮翠屏用這樣一句話「總結」她在甘肅所做的工作。這些年，不管是獻策甘肅生態建設、農村養老服務、蘭州新區建設，或是捐助地震災區重建、幫扶貧困小學修建，抑或是帶領港企參會、向港企介紹項目等，都有這位老人的身影。

夫妻委員：「甘肅是我的第二故鄉」

這些年，甘肅自然災害頻發，每每聽到這樣的消息，馮翠屏老人的心總是一陣酸疼。她說：「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，總感覺甘肅有什麼東西牽掛着，讓我把這裡作為自己的第二故鄉。」

馮翠屏的先生在陝西省政協擔任常委，夫婦倆從小就讀於勞工子弟等愛國學校。每天，他們都要在學校裡唱國歌、學習中國歷史和文化。如今，馮翠屏讓自己的大兒子在工作之餘就去北京，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歷史，通過觀看戲劇、舞蹈等全面了解中國。「不僅讓他熏陶，我也抽空學，還要把普通話學好。」

說起普通話，去年，馮翠屏第一次擔任甘肅政協委員時，由於不會說普通話，小組討論會上不敢發言。如今第二次再來，她已然能用略帶「港味」的普通話清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。她說，現



■馮翠屏在小組討論會上與委員交談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許亞飛 攝

在所有的港澳委員都在努力學說普通話。

前來參與會議之時，馮翠屏攜帶了一個完全能裝得下她身體的大箱子，從香港坐大巴過關到深圳，再從深圳乘飛機到蘭州機場，抵達賓館時已近7個小時。記者見到她時，她正在整理箱子，裡面除了幾件衣服，幾乎全是提案和考察甘肅時的資料。

「我這箱子就是能裝，裡面全是好東西，這些資料我都捨不得扔，我要全部拿回去。」馮翠屏說，7個小時的輾轉對她來說，身體還吃得消。她希望自己的身體能一直好下去，這樣的話，還能堅持再來甘肅幾年。



■馮翠屏希望身體能一直好下去。她說，這樣就能多來甘肅幾年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許亞飛 攝